

徘徊在時代的邊緣

● 李振聲

臧克家編選的《中國新詩選》一味貶損徐志摩、李金髮的詩；武漢大學教授劉綬松對「新月」、「現代」統統大加撻伐，均催發了少年陳建華憑自己的眼睛去看個究竟的強烈意願。



陳建華：《陳建華詩選》（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

《陳建華詩選》（引用只註頁碼）主要由《紅墳草》和《〈紅墳草〉詩傳》（以下簡稱《詩傳》）兩部分構成，前者選錄作者1965至1969年詩作近四十首（篇），後者是作者特為這些少年時期的詩作所寫的十六章「本事」鉤沉，或曰傳、注、箋（這些字都取其古漢語意），是2006年甫告完成的。「詩」與「傳」合則相得

益彰，一旦離析，將俱受其損。結構主義講「整體大於部分之和」，道理庶幾近之。「詩」和「傳」並非各自自足，而是互涉、互文和互證的。筆者個人更偏好《詩傳》部分，其處理主題和材料的方式極其細膩綿密，所見所思，對精神面向的銳利觀察，對往日時光的一往情深，伸縮迴旋之間，在在別出機杼，讀來令人悄然動容。

從《詩傳》的追述中我們得知，少年陳建華詩藝上的學步，也不外乎是從冰心《繁星》似的童稚和郭沫若《天狗》般泛濫無歸的情緒揮霍等流行套路開始，不過，天性穎悟加上青春期「逆反心理」的推波助瀾，他很快便對1950至60年代臧克家編選的那本準正典化、因而發行甚廣的《中國新詩選：1919-194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深感不滿。這本「政治取向至上」的詩選，不錄一代「詩宗」徐志摩、「詩怪」李金髮的詩也就算了，還要在序言裏一味貶損他們，這就從反面激起了少年陳建華的好奇。此外，武漢大學教授劉綬松對「新月」、「現代」統統大加撻伐，也催發了這位懵懂少年憑自己的眼睛去看個究

竟的強烈意願。結果是，一經接觸，便甘之如飴，沉溺得難以自拔。尤其讓人覺得慶幸的是，這位少年居然無師自通地從開明書店出版的四卷本《聞一多全集》裏，發現了西南聯大時期聞一多編選的《現代詩鈔》，並如獲至寶，一字不漏抄錄了下來。

許多年之後，陳建華回想當時情景，內心依然充盈着濕潤的感激之情。這個懵懂少年從聞一多《現代詩鈔》中辨察出一個個不同凡響的「個人」的聲音，朦朧中意識到這些「個人」的聲音之於「新詩」的「豐富」之間有着某種難以言喻的意義和關係。當此之際，一種神秘而又神聖的詩歌啟蒙儀式，一份與詩之間訂立的最初契約，也就在他身上迅速宣告完成。正是依託這樣的穎悟和大師的暗中襄助，這位少年在詩藝上學步不久，便順理成章地踏上了正途。須知，在少年陳建華所置身的那個特定的歷史語境中，詩的寫作基本上是與意識形態的「改造」機制和個人的道德祭獻儀式糾結不分，成為消抹乃至扼殺個體生命意識的「脫胎換骨」的神話之一。而詩人的立足之本，恰恰依託的是個人經驗、個人精神自由、對個性差異異乎常人的靈敏感覺，以及基於個人良知的責任和承諾，對個人生存經驗和意義的探索。即便是對現實困境的痛切感知，也總是從對個體內在經驗的注重那裏折射出來的。

徐志摩、朱湘，尤其是朱湘詩中對古色古香的斑斕典故的援引，引導少年陳建華毫不顧忌地去與那個鑲金嵌玉、攀柳蕩荷的古典世界接上氣脈。從收在《紅墳草》中的詩作來看，少年陳建華的古典修養之

好，令人驚嘆。他所結交的志同道合的年青詩友，在古典和西方現代文化修養方面所表現出的「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的靈氣，其實並不代表當時年青人甚至年青知識者中間普遍的精神狀況、知識修養和文藝趣味。毋寧說，他們當時是屬於不見容於當道的一個「異類」。

隱潛在這些有着濃厚中國古典詩積澱的少年詩作背後的，是極為繁富的精神譜系。我們可以憑藉作者在《詩傳》中的提示，一一索驥。《詩傳》談到《繡履的傳奇》一詩，至今仍有難以掩抑的得意之色，原因是：即便是鋪天蓋地、嚴絲合縫的政治掛帥的年代，也終究難免百密一疏，留下一些罅隙，讓少年陳建華在歷史想像的馳騁中，實踐他個人僅有的一點精神自由。這種精神相對自主的寫作，讓少年陳建華分明體驗到了令他至今難忘的「挑戰的刺激」（頁139）。在人們紛紛集體交出耳朵、眼睛、頭腦和淚水的綜合性反常的社會症候面前，一顆帶着「小我」的叛逆性，決計遠離「康莊大道」的年輕心靈，將意味着甚麼，是不難想像的。

顯然，從晚唐的古典遺澤中尋索詩意和獲取曲折多姿的詩的形式因素的奧援，給自己的詩灑注以斑駁迷離的歷史文化迷魅，並不單純是在發懷古之幽情或一味張揚擬古的才藻，而是在對歷史瞬間的人性境況作出頗見少年人繁富想像力的想像性重構中，在獲取生命衝動的滿足的同時，對壓抑的現實政治的一個回應。少年陳建華的詩作，是一種圍繞個人生存與其周圍整個世界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展開的寫作。

少年陳建華與他的詩友，在古典和西方現代文化修養方面所表現出的靈氣，並不代表當時年青人甚至年青知識者普遍的精神狀況、知識修養和文藝趣味。他們當時是屬於不見容於當道的一個「異類」。

如果說新月詩人主要將少年陳建華引導到斑斕的古典世界，那麼受過法國象徵主義詩學洗禮的李金髮和馮乃超、穆木天諸人，則將如何打通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間重重隱秘關節的手段提示給了他。

如果說新月詩人主要將少年陳建華引導到斑斕的古典世界，那麼受過法國象徵主義詩學洗禮的李金髮（晚年卞之琳似對此頗有置疑）和後起的馮乃超、穆木天諸人，則將諸如如何打通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間重重隱秘關節的手段提示給了少年陳建華。在《流浪人之歌》中，古典主義、象徵主義、超現實主義是錯落交澱在一起的。既有馮乃超的《夢》的片段，更有穆木天的《蒼白的鐘聲》的音色，而詩句諸如「斑駁的 蛹殼的 白楊上」，或「蜘蛛的 破網的 頹牆上」（頁20），按作者《詩傳》的指認，顯然也有着對賈島的耽迷。

如所周知，賈島對荒涼、破頹和陰暗都有他獨特的觀察。《瘦驢人之哀吟》作了戲劇化處理的李賀身上還重疊着賈島和李商隱，寄寓了對詩人死亡體驗的想像，而此一想像，既由李金髮的詩句「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敷衍而來，又有着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惡運》（*Le Guignon*）中「我的心像一面低沉的大鼓，／敲奏着喪禮的哀歌去送葬」等詩句的投影（頁100）。用古今中外一系列駁雜的意象來提示微妙的心智活動，不同的文化脈絡糾葛在一起，形成所謂異質混成的特色，似可見少年陳建華試圖對固有的詞語重新編碼，以便重新激活其詩意空間的野心和努力。

可能是時隔多年的緣故，就連作者自己也對其少年詩作中古典主義、象徵主義、超現實主義錯落交澱的景況不由得大感驚訝，並將之歸因於「童心」純真使然：「那時童心猶純，還沒有受到觀念的洗禮，對『傳統』和『現代』不生成見，這兩

者水乳交融，在血管裏流淌。」（頁91）但其實，就是在現代詩發祥地的西方，現代詩與傳統之間的關係也向來錯綜複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並無截然兩分的「斷裂」之說。葉芝（William B. Yeats）詩裏的愛爾蘭歷史淵源，艾略特（Thomas S. Eliot）對玄學派的情有獨鍾和他的天主教信仰，龐德（Ezra Pound）對各種文化精神的吞吐襟懷更是巨大得令人吃驚。

中國現成的例子同樣比比皆是：從不諱言前期詩作中有李商隱、姜白石及《花間詞》「風味的形迹」的卞之琳，同樣也一再坦陳艾略特曾經宰制過他的心靈；而馮至的詩作既有杜甫的身影，也有里爾克（Rainer M. Rilke）的召喚。事實上，與傳統氣脈的接續，未必意味着對追求現代性的自由度的限制。把中國現代詩看作橫向的移植，而非縱向的繼承，在現代詩與反傳統之間毅然決然地畫上等號，如果不是出於激進文學史家基於「矯枉過正」策略的筆走偏鋒，那也只能看作一種似是而非的成見。

1930至40年代，臻於全盛的歐美現代詩，主要是艾略特、葉芝、里爾克等人的詩作，憑藉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合縱連橫之勢，加上秉賦特異的燕卜蘇（William Empson）經由日本輾轉來到北京大學及南遷後的西南聯大講授英國文學，曾在卞之琳、馮至及其學生一輩的「西南聯大詩群」（穆旦、杜運燮、陳敬容、鄭敏、袁可嘉等）身上，產生過璀璨耀眼的折射。但1950年代以降，現代主義遭到摒斥。不過也不是沒有例外：1957年北京《世界文學》即刊出過波特萊爾逝世一百周

年的紀念專輯，刊有陳敬容的十餘首譯詩及阿拉貢 (Louis Aragon) 的長篇論文。

陳建華在《詩傳》中還記述了文革前數年，中國作協機關刊物《文藝報》曾刊發過袁可嘉〈略談英美「現代派」詩歌〉、〈論英美「意識流」小說〉兩篇論文。尤其是前者引述的艾略特等人的中譯詩作，在少年陳建華讀來，「只覺得字字珠璣，暗藏玄機，與我所熟悉的詩風完全不一樣。」(頁126) 此類可以了解歐美現代詩學詩風一鱗半爪的文章，當時實屬鳳毛麟角，以致少年陳建華竟「因為喜歡」而抄錄了兩遍(書中作兩篇，當是兩遍之誤)：先是抄在練習冊上，後又抄到日記本上。

認真說到現代主義詩之於少年陳建華的實質性影響，基本上來自「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波特萊爾一脈。偏好視覺上的設色穠縟，以及詩思的精微複雜，喜歡在一個個意象脫離平常關係的跳躍連綴中展開詩思的脈絡，諸如此類，少年陳建華顯然從其他象徵主義詩人那裏得益甚多，但請不要忘記波特萊爾開象徵主義先河之功。《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 以狂想型的自我，從內部挑戰甚至顛覆西方理想主義的詩學傳統乃至整個思想文化傳統，似與少年陳建華壓抑的處境和愁苦的心境格外契合，故而在他的內心引發了最為強烈、最為持久的共鳴：「波特萊爾成了我的引導，但那種精神的壓抑和愁苦在我的具體境遇裏，更多地與壓迫和牢籠的意象相聯繫」(頁160)。波德萊爾不屑於像他的前輩詩人如浪漫主義的雨果 (Victor Hugo) 所做的那樣，繼續充任人類的精神導師，他

以「街頭浪遊者」(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命名)的心眼，體會到了現代技術文明之於人與自然、意識與無意識、經驗與體驗之間，那種空前的、毀滅性的離間和割裂的力量，無意中也流露出對人類走向庸俗的拜物主義文明的某種驚懼。而說到近百年來的中國，與現代技術文明結有最親近因緣的都市中，少年陳建華生於斯、長於斯的上海，自然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少年陳建華對波特萊爾的一往情深，除了波氏「自覺擔負起美的惡運」的決絕，應合並激發了他當時內心深沉的渴望、在都市氣息體驗上的天然親近，顯然還得力於詩友間的引導和提攜。《詩傳》中涉筆所及朱育琳、錢玉林、王定國、汪保聖這幾個意氣相投的知己好友時，多是這本詩文集中最動情的文字。他們是1960年代上海最具才情，也是最先覺悟的少數青少年之一。他們心態的開放和對知識、對美的渴求，視自由與正義高於一切的內心準則，卻被粗暴的時代指斥為大逆不道。其中，先前曾在北大就讀西方文學，師從朱光潛，隨後又懷揣某種耽迷於科幻的烏托邦激情，返滬攻讀同濟大學工程技術專業的朱育琳，他那絕對意義上的精神追求、詩性人格以及過早的非正常死亡，隱喻了一種高貴而沉靜的事物在那個時代的破碎和消逝，曾經並且至今仍在深深地影響着陳建華。1993年他特意为誼兼師友的朱育琳離世二十五周年，寫下了淒艷絕美的〈天鵝，在一條永恆的溪旁〉一文。

由少年陳建華抄錄並珍藏至今，現在附錄在《陳建華詩選》中的朱育琳譯波特萊爾《惡之花》八首，

波特萊爾《惡之花》以狂想型的自我，從內部挑戰甚至顛覆西方理想主義的詩學傳統乃至整個思想文化傳統，似與少年陳建華壓抑的處境和愁苦的心境格外契合，故而在他的內心引發了最為強烈持久的共鳴。

《詩傳》將詩裏的涵義與世界級現代大家的理論一一對應掛鉤，也許有些事後重修家譜的嫌疑，畢竟是事隔將近四十年後經由詮釋所作的追認，大可不必當真。

若與坊間現有各家同名譯作細加比照，可以相信陳建華對之所下「非凡的功力」、「力敵千鈞」的評斷（劉燕子：〈訪談陳建華博士〉，頁222），絕非出自隨口敷衍；而朱育琳對戴望舒譯波氏《惡之花掇英》因不能壓足於心所發的「苛評」，曾讓少年陳建華頓生「立見佛身，身披霞光」之感（頁152）。

在上海這片曾經的「東方巴黎」的廢墟上，在革命呼嘯而去遺留下的某個角落，波特萊爾靈魂的騷動似乎復活在這位年青人的心中。《無題》中，「眼前常閃現鷹爪的黑影，／使受傷的翅膀震顫，不能一動」，裏邊的「不能一動」云云，係化自朱育琳譯波特萊爾《裂鐘》（*La Cloche fêlée*）：「像一個呻吟的受傷者，遺棄在屍堆下血泊中，掙扎着死去而不能一動。」《無題》另一處的「不要悲傷，朋友，我將祭起／黑色的大纛，使你在微笑中合眼」，則化自陳敬容譯波氏《憂鬱病》（*Spleen*）末句：「殘酷的暴戾的愁苦／在我低垂的頭上豎起了黑色的旌旗。」（頁160）散文詩《雨夜的悲歌》，抒寫者目睹時代悲劇進入高潮，懷想波特萊爾《天鵝》（*Le Cygne*）的結句：「想起俘虜，被征服者……一切悲淒！」筆端不禁流淌下巨大的同情：「我心中也響起一支歌，像一群囚徒唱響在陰暗的牢房，像一片翻騰的海水，浮動着無數頭顱，他們的臉容是這麼蒼白而憔悴……」（頁161）

正如前文已述，寫詩是一個巨大而精微的生成過程，常常是具體到一首詩，裏邊即有許多的接受和影響。說句稍稍誇張的話，往往一個文本的後邊，會有無數隱潛的文

本，沒錯，整個文學史都參與進裏邊。有些明眼人不難看出，但有時文化脈絡的因果相循卻了無痕迹，甚至連作者自己也未必說得清楚。據《詩傳》第十五章給《夢後的痛苦》、《荒庭》、《致命的創口》作的箋注，詩的作意是想憑藉出現在夢境中的那些陷入困境的蛇、獅和狼，來抒寫內心的荒涼、精神的受抑，以及天性不甘禁錮而激憤的緊張。如《荒庭》中的描述：

當我獨自一人默默而語的時候，
一隻猛獅從靈魂的地獄裏跳出，
戴着腳鐐亂舞，發出震裂的怒吼，
暴突的眼睛把燃燒的光焰噴吐。

牠要掙脫，回到自由的森林！
那裏有成群的野狼向牠屈膝。
但來了猙獰的獄卒，將牠死命
鞭笞，牠終於倒下，昏在暗角裏。
（頁158）

《詩傳》云：

在這裏獵獵風起，莽林嚎吼，彷彿聽到了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或尼采式「超人」的降臨。「猛獅」或許剝落了畫皮而露出了「真我」，或許是自我的新面具。所謂「成群的野狼向牠屈膝」是曖昧的，但我不想多作思考，這個意象一旦「跳出」，自然而橫蠻，含有抽象意義上的「人」的鏡像，是無可理喻的、輪廓欠分明的。（頁158-59）

《詩傳》將詩裏的涵義與世界級現代大家的理論一一對應掛鉤，也許有些事後重修家譜的嫌疑，畢竟是事隔將近四十年後經由詮釋所作的追認，大可不必當真。而這裏想補充

的是，除了《詩傳》所作的追溯，這首詩的背後，至少還有着里爾克的《豹》(Der Leopard) 這樣一些隱潛文本的存在。在里爾克筆下，被鐵欄圍困得萬般疲憊的那頭豹子的悲劇性境遇，與少年陳建華《荒庭》中那頭「從靈魂的地獄裏跳出」的猛獅之間，顯然有着某種關聯。

上述種種，有所依傍的「新古典」詩作也好，或直接間接蟬蛻於西方現代詩的詩作也好，歷史想像力是有了，世界性視野和文化的錯綜感也有了，確實使詩的包容量大獲拓擴，有時甚至還會有過度濃縮和膨脹之嫌。而處處有出典須加仔細覆案，所謂的「無一字無來處」，又顯得詩性「隱語」過於自洽和過於現成，這些是否會對詩人領會、穎悟、表達、想像更為直接和開闊的生存經驗，無形中造成遮蔽或削弱？又是否會妨礙到詩人對現實中個人真實處境和生命經驗的直接處理呢？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但在一些詩裏，本真經驗、日常細節，尤其是個人如何應對現實處境等信息，雖不能說一概闕如，但漫漶不清，較難索求，似也是實情。

《急漩渦中的孤舟》除去開頭的兩句，還多少可以分辨出它們之與杜甫的「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秋興》之八)以及早年臧克家新月派時代的詩句「日頭墮到鳥巢裏／黃昏還沒溶進歸鴉的翅膀」(《難民》)之間，留有若干「家族類同」的痕迹，總體上則掙脫了舊詩詞中的纏綿感情，也較少存在西方現代詩語的印記，是作為一個生活在歷史的嚴峻時刻的現代人的感受、思考和抒寫。詩中洶湧的江水

和隨時可以吞噬一切的江心急渦，隱喻反常的社會氣候；而出沒於江心的斷桅孤舟，則相應地暗喻承受着巨大壓抑和威脅的個人生存和個人語境——一個是那麼巨大，鋪天蓋地而來，一個卻是那麼的渺小和無助，勢孤力單：

聚攏的黑雲像一群兇狠的烏鴉，
嘴尖一齊啄向夕陽垂死的白眼。

……

洶湧的江水像一頭受傷的猛虎，
向人間吼哮，張開血盆的巨口。
聽呀，又一陣天外狂飆的怒吼，
又一陣礁石碎濺，濁浪崩空。
看呀，一隻沒遮欄的斷桅的孤舟，
在江心的急渦中殊死地搏鬥！

(頁15)

幾乎是在孤獨地進行一場無望取勝的抗爭，但卻依然獨自承擔自己的厄運及其行為後果，有一種義無反顧的對生命的洞徹。少年詩人寫出了生存的壓抑和意欲捍衛內心世界完整的意志。即便生存像崩空的濁浪朝斷桅的孤舟呼嘯着壓來，但我們仍得擁有不為其所傾靡的自持和堅卓，在幽暗中保有人性應有的一點硬朗和亮點。詩中把壓抑和承受，提升到了命運悲劇和某種近乎神話的高度；張揚到極度的危機性力量，全都擰在了一起，造成詩境怪石嶙峋的效果。如果說，前面已經述及的詩作，主要是記憶、經驗、良知、詞語和夢想的含混而擾人的綜合，那麼像這樣的詩，則是對現實處境所作的一種相當直截了當的處理，直接呈現了心靈和個人生活的真實狀況，直接呈現了詞語的表達力量。

詩的背後往往有着一些隱潛文本的存在。在里爾克筆下，被鐵欄圍困得萬般疲憊的那頭豹子的悲劇性境遇，與少年陳建華《荒庭》中那頭「從靈魂的地獄裏跳出」的猛獅之間，顯然有着某種關聯。

陳建華寫於文革期間的詩作，不僅指向個人語境的精神和心理領域的那種噬心的痛楚經驗，而且指向世俗政治與現實人生場景噩夢般的反常性質。家國政治與個人精神歷程暗中糾葛在一起，聚合為意義和情緒的迷團。

文革作為當代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史上一個重要時段，其特殊的地位及其對整整一代乃至幾代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刻影響，都是不言而喻的。革命，本來意味着處於壓迫狀態的事物獲得解放的機會，因而天然具有重獲自由、如釋重負的性質，但我們所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在狂歡的外表下卻往往意味着各種集體性的反常症候，它所製造和依託的「宏大敘事」邏輯，所謂「歷史趨勢」、「真理法則」，反而總是導致對個人的控制和傷害，對精神思想自由的剝奪。少年陳建華1966年10月寫於「大串聯」廣州旅次的短詩《湖》，裏邊那個「發出夜霧般的嘆息」的「憂鬱的陌生人」（頁11），便洩漏出抒情主人公之於翻江倒海的時代的疏離感，隱喻着個人成長與歷史成長之間，橫亘着一道難以彌合的巨大裂縫。

少年陳建華寫於1967年10月的《鐘聲》，寓有對已知的「歷史趨勢」的失望，對未知事物的揣揣不安、驚慌和滿懷哀愁的測度和眺望，並宣諭了一種老子式的悲憫：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在個人意志膨脹到自信其單憑意志的力量即可無所不能的時刻，「偉人」面對鐘聲所喻示的「時間」，是否也自覺其「有限」？是否省察到自己其實與所有凡夫俗子並無不同，本不擁有阻擋、操控時間鐘聲所曳出的那道「怪影」的無邊法力？這樣的質疑，在人們紛紛向政治威權交出自己的腦袋、耳朵和嘴巴，爭相領受「狼門私字一閃念」式的道德狂熱所帶來的那種畸形的「淨化」感的那個年代，不啻為「大逆不道」！

像一個變換黑衣白衫的怪影，
大笑着從空中逃遁。誰能留住你
——匆匆的熟客，你使偉人們
心力交瘁，徒然悲泣。

我佇立在暮色中，懷着哀愁，
傾聽這鐘聲，像失帆的小舟
在宏大起伏的波浪上顛簸，
無奈凝視着空空的雙手。

（頁5）

表達這樣的反諷和懷疑所需要的清醒的腦筋和思想道德的勇氣，恐怕是生活在當今之世的一班後生小子所難以想像的。相信少年陳建華在寫下這幾行詩的時候，與他在《詩傳》中回想寫作散文詩《雨夜的悲歌》，不得不對「毒日頭」發出詛咒的時候（頁161），所體驗到的內心顫慄，應該是差相彷彿的。這類詩作，不僅指向個人語境的精神和心理領域的那種噬心的痛楚經驗，而且指向世俗政治與現實人生場景噩夢般的反常性質。家國政治與個人精神歷程暗中糾葛在一起，聚合為意義和情緒的迷團。一方面是隱喻中的現實世界的災難與壓抑，一方面是這個世界中有着敏銳感受和洞察力的少年，在訴諸內心晦暗的象徵主義抒寫中，徘徊尋覓於靈與肉、真與偽、善與惡之間，試圖從中求取人性的成長，找到人性的真諦和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其結果，便是成就了這些曾經被埋沒了數十年，現在終於被編入《陳建華詩選》，可以為眾多讀者所把讀的詩作的生成和存在。

李振聲 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